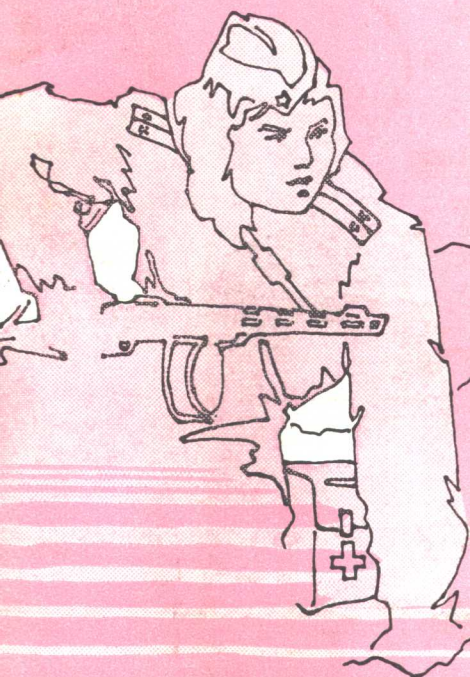


心灵的召唤



心 灵 的 召 唤

〔苏〕塔马拉·瑟切娃 著
李家云、王殿凤等译

军 事 译 文 出 版 社

一九八六年二月

心灵的召唤

〔苏〕塔马拉·瑟切娃 著

李家云、王殿凤等译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昌平环球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 15 1/8 字数：350,000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9·04 定价：2.80元

内 容 提 要

《心灵的召唤》是苏联著名女作家塔马拉·瑟切娃写的一部自传体小说，畅销苏联和世界。全书讴歌了苏联妇女在卫国战争期间可歌可泣的战斗生活和战后参加重建工作的劳动激情。着重刻画了她们在战场上、在敌后、在家庭和爱情生活上的心灵深处的变化。故事情节动人，战斗和生活气息浓厚，读来给人力量和鼓舞。

第一部 盲目跳伞

(一)

“你看，这不是到了！”格里沙在过去一家地主花园的雕刻着花纹的大门前猛然把锃亮的“艾姆卡”停了下来。在花园深处，绿油油的林荫路尽头，闪现着一所整齐的大别墅。大门上悬挂着一条大红横幅，上面写着：

“利沃夫少先队夏令营”。

“女公民，请付车钱吧！”格里沙手不离方向盘，调皮地望着我。

可我不愿意和丈夫分手，要知道这次我们得分别整整一个星期。

“那，你就追吧！”我一面喊着，一面跳下汽车，向花园跑去。

“啊哈，你呀！”格里沙追逐着我。

他追上了我，抓住我的双肩，把我扳向他……后来，我们手拉着手在林荫路上漫步而行，高声大笑。我们那时都很年轻，十分欢乐。

“喏，我累了！我们坐一会儿吧！”我说道，坐到公园的一条长椅子上。

“你跑得好快呀！”格里沙摘下军帽，用手帕擦着额上的汗水。

“我可不是为了好玩才去参加竞赛的！你总是取笑我。

而在我到射击人员训练班去时，也取笑我。难道你不喜欢你的妻子是一个特等射手吗？你倒是说呀，你喜欢不？”我追问道。

“那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格里沙皱起了眉头，“步枪——不是女人摆弄的。女人就应当是个女人。”

我不是第一次和丈夫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了。现在，他显然在我脸上发现了他所熟悉的固执表情，不想争吵，便把交谈话题转成开玩笑的样子。

“哎呀，你呀！这个好吵架的人。”他笑了，搂着我：“你打算向谁开枪呢？你是不是打算在战时到前线去呢？”

“那为什么就不行呢？”我挑衅地看着丈夫说：“你还记得电影《前线女友》吗？那些姑娘受到多么好的射击训练。”

由于预感到战争即将来临，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想到在祖国困难的时刻我应去的岗位——到前线去，到战士的行列中。我不能做一个徒托空言的共青团员。卓越的女革命家多洛雷斯·伊巴露丽^①不就是年青的女英雄吗！正象人民叫她“帕西奥娜丽雅”^②一样，她有火样般的热情。为了纪念这位西班牙女共产主义者，我甚至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叫多洛雷斯。

注：① 多洛雷斯·伊巴露丽：西班牙和国际工人运动与民主运动杰出的女活动家。她从二十岁起参加工人运动。曾用笔名帕西奥娜丽雅给各工人报纸撰稿。是西班牙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以何塞·狄亚斯和伊巴露丽为首的西班牙共产党于1936—1939年领导了西班牙人民反对法西斯的英勇斗争。她在一九四二年起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一九七八年当选为西班牙共产党主席。

② 西班牙语，意为热烈。

“呃，你还是个女幻想家呀，塔玛拉！”格里沙傲慢地说。从斜纹呢马裤上把龙牙草刺摘下来，他是一个十分仔细的人。“当然了，我们的邻国是不可靠的。法西斯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挑起战争。可是万一有这种情况，你就收拾好东西，动身回家去。在战争中你什么也干不了。我们不要再说这个了。”听起来这话说得很绝。

我看出争论起来没有什么好处，便不再作声了。可没过几天我又不得不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是啊！我们谈论战争，毫无疑问，战争是离我们很近了。

三个月以前，经过长时间的分居生活后，我从克里木到利沃夫来找丈夫。我的丈夫格里高利·瓦西里耶维奇·热尔涅夫在部队服役，是一个中尉排长。克里木故乡留下了父母两位老人和小女儿洛罗奇卡（我们这样叫她）。

我在利沃夫没有无所事事，开始在共青团市委会里担任少先队的辅导员。

我们在城里有一个住处，可是后一段时期，我们只是在假日才在那里见面。因为格里沙整周都要在军营里住。

今天丈夫出差，租了一辆小汽车把我送到少先队夏令营，现在他该返回部队了。

“这地方很好，”格里沙向四处看了一下，打破了沉默说，“空气多么清新！”

是啊！清晨是美好的。公园里凉爽的林荫道被露水润湿了。旭日从树后缓缓升起，花园里静悄悄的，少先队员还在沉睡。一只小鸟兴致勃勃地在树枝上啁啾，蜜蜂在花坛上发出嗡嗡的声音。

“没什么，”格里沙说，“很快就放假了，我们到克里木，到海边去！……我们去游泳。我教洛罗奇卡游泳。她已经长大了，很快就六个月了！”

我笑了。突然……

“哎呀！……格里沙！”我抓住他的手，一只蜜蜂就在我鼻子底下盘旋并且嗡嗡地作响。

“格里沙，格里沙！……你是怎么回事？”

可是丈夫只是看着我躲闪这只纠缠不休的蜜蜂哈哈大笑。

“哎呀，你呀！”他讽刺地说，“还是个特等射手呢！”他看了看表，急忙说道，“呃，我该走了！”

我把丈夫送到大门口说：

“下星期日来吧！我们夏令营开幕。”

“好，我来。”

我目送汽车远去，回到了夏令营，在中间的一条林荫道上，我追上了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她手上拎着一只旧箱子。

“送孩子到夏令营吗？”我问道。

“对，”她说，开始打开一条白手帕，里面整整齐齐地包着许可证。

在我察看许可证时，这个女人说：

“我有五个孩子，法西斯分子到这里时，把我丈夫打死了，只剩下了我和孩子们。谢天谢地，我们的人来了，帮了我的忙，他们答应我下星期再给我两个许可证。而所有的孩子都免费学习，我在工厂工作……”

“走吧！”我说道，把他们领进走廊去找少先队辅导员。

这时，住地响起了号兵的起床号声。一群晒得黑黝黝的孩子从卧室里向我们跑过来。他们高高兴兴地互相你推我拥地顺着宽阔的大理石楼梯跑下来，开始准备作体操。

夏令营里一切都苏醒过来，一切都栩栩如生。阳台上的电唱机发出了熟悉的配乐体操的曲子。

这位妇女与孩子们告别时，眼泪夺眶而出：

“我们的孩子终于享受到了今天的幸福。可在老爷们统治的波兰，只有老爷们的孩子才能过这样的生活……”

她擦了擦眼泪，又看了很久，摇了摇头，笑了。

早餐后，夏令营主任来找我。

“塔玛拉·阿列克山得罗夫娜，我们去检查一下，去看看孩子们营火会准备得怎样……”

正在演奏风琴，孩子们跑上专门为演出准备的木台。

“开始吧！”少先队辅导员拍了拍掌，发出了命令。

一群身穿短芭蕾舞裙、头戴黄色花环的小姑娘跳起舞来。她们向四面散开，合着音乐的节拍，优美地挥舞着双手，然后组成圆圈，把戴着黄色花环的头低了下来，形成了带黄色花心的白菊，白菊周围一些身穿碧绿色芭蕾舞裙和在阳光下舞动着透明羽翼的“蜻蜓”开始飞来飞去。

这些孩子们清澈的双眼显现出多么喜悦、幸福的神色啊！孩子们在辅导员们的帮助下，自己缝衣服。人们谈论的只是篝火旁的演出。

整整一个星期都在奔忙。终于到了星期六，这一天大家都特别忙乱。一些人在工作间把衣服缝完，另一些人为了篝火晚会准备木柴，还有一些人写海报和请柬——孩子们的父母应当来参加庆祝节日。

孩子们激动兴奋得睡觉前还在议论即将来临的庆祝会。

“我妈妈能收到邀请明信片吗？我今天才发出呀，”一个小“蜻蜓”问辅导员。

“当然了，一定能收到。因为这儿离城里很近。不要激动，安静地睡吧！”辅导员整理了一下枕头，劝说她：“所有的人，都会来的，会很欢乐……睡吧，孩子们！”辅导员关上灯走了。

寝室里又传出了一阵低语声，后来才寂静下来。

“我们也去睡吧！”辅导员对我说。

“明天格里沙会来参加篝火晚会的，”将要入睡时，我想到：“太好了，他很快就有假期了……我们到克里木去，然后带上洛罗奇卡。”

我非常想念我的小女儿，急不可待地盼望着重新见到她的那一时刻。

（二）

一阵令人莫解的隆隆声惊醒了我。不祥的火光照亮了房间，大开的窗户玻璃叮当作响，少先队辅导员跪在床上向窗外张望着照得红彤彤的地平线。

“出什么事了？”

“不知道。好象是爆炸。利沃夫起了大火……”

下面的话我已经听不到了，因为它被高射机关枪的射击声和夏令营上空飞过的一些飞机隆隆声淹没了。我们跑到阳台上。远处，显然是在利沃夫，爆炸声隆隆作响。树叶和大理石蓄水池的白塑像映上了红光。楼房的高层窗上照出了火光。我们木然不动地站立着，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受惊的孩子们跑到邻近的阳台上。

“我们去看看孩子！”辅导员喊道。

我们在寝室门口碰上了一个小姑娘。她把蜻蜓的纱装和白芭蕾舞鞋紧紧搂在胸前。她身后跑出了一些大女孩。

“孩子们，你们到哪儿？不要出去！”少先队辅导员发出了命令，“躺到床上！”

可是大家已经都起来了。爆炸声又震动了大地。小孩子们哭了，大些的孩子没有作声。

“现在不开篝火晚会了吗？”小姑娘问道，依然把蜻蜓服紧紧搂在胸前。

“会开的，一定开……跳舞会、篝火晚会，都开。”我竭力抚慰围在我身边的孩子们。

当我又走到阳台上时，天已经亮了。墙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孩子们手写的海报：“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日——少先队夏令营开幕式。晚七点列队集合，升旗。在篝火旁进行群众游戏、跳舞”。

楼梯那冰凉的大理石使我想起了，我还光着脚呢！我回到房里去穿鞋。夏令营主任随我走进房内。

“瑟切娃，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他问道。

“我猜是……”

是啊！一切都很清楚——战争爆发了！

“孩子们的父母来了，”主任说，“注意，不要让他们惊惶失措地把孩子们带走，我到城里去找市党委去。”

他走了。“现在格里沙在哪儿呢？”我不安地想道，“也许，已经打上仗了？”

我到花园里，母亲们哭着站在大门口。少先队员和父母们见面了，可是不象我们准备的那样。孩子们哭着，母亲们哭诉着利沃夫如何遭到了轰炸。

孩子终归是孩子，小姑娘们分别地问：“可以把化装跳舞用的服装带走吗？”

“带上吧！带上吧！”我们回答说。

小娜塔莎一直在焦急地找她的少先队领巾，最后还是没有找到，哭着走了。

在收音机传送出政府公报的内容时，不止一次地被一些陌生的刺耳声所打断：

“恶棍！”我们的广播员骂道，“他们在进行干扰……”

可是我们终于听明白了：敌人背信弃义地向我们进攻了，党号召大家起来保卫祖国领土。

人们自发地举行了集会。

作出了决定：号召所有共青团员自愿上前线。这里也拟定了名单，登记了十一名男人和两名妇女，其中有我的名字。我们中间有炊事员、少先队辅导员、仓库管理员，打算步行到军事委员会去，刚走到大门口，一辆载重汽车开来了。司机把我丈夫的来信递给了我。格里沙要我立即到利沃夫去，让我把东西收拾好，就乘这辆汽车赶往火车站。在抵达火车站之前，必需迅速行动。他写着，让我到克里木去住，并且等他的信。

我从司机那里知道我丈夫所在的部队已经去前线迎敌。我和同志们商量了一下，于是我们请司机把我们所有的志愿人员送到团司令部去。

“好，坐下吧！”司机同意说，“不过……”

他看了我那花花绿绿的中国绸连衣裙一眼说，法西斯的飞机追逐每一个目标，在这种时刻连衣裙会暴露汽车的目标。

“那怎么办？我在这里没有别的衣服。”

司机从坐位下面拿出了他自己的旧军装。

“拿去吧……再给您一双靴子！”司机把一双带铁鞋掌的沉重的士兵皮靴子扔到我脚下。

我遗憾地看了看自己那双式样美观的淡褐黄色凉鞋。同伴们看到我犹豫不决，有人责备地冲口说出来：

“连破烂也舍不得……说起来，女人毕竟是女人！”

“快一点，现在是战争时期。”司机严厉地瞪了我一眼，从车身上拿出了油箱，“现在我给车加点油就走……”

我跑到孩子们的工作室去换衣服。昨天房里还热热闹闹，充满了孩子们银铃般的声音，现在却感到房里沉闷，令人窒息。

一条长桌子上扔满了剪碎的彩纸和涂上颜色的纱布，我木然地坐到桌旁的一条长凳子上。“是啊！一夜之间一切变化是多么大啊……”

到现在我才真正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心忐忑不安地跳着：“我现在该怎么办？……应当想一想，也许，格里沙是对的：我应当回家？不，不！到前线去！”我脑海里闪过另外一种想法：“要是我们都被打死，洛罗奇卡怎么办？”

我的喉咙哽咽了，眼泪顺双颊流了下来。

手里拿的不是手帕，而是一条少先队红领巾。早晨娜塔莎找的就是它。昨天她在试衣服时，把它忘了。孩子们的脸是多么可爱啊！可今天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呢？

又传来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象早晨一样，玻璃又震颤起来，高射炮隆隆地轰鸣。我扑向窗户，爆炸的隆隆声越来越大了，天上升起了一团团黑烟。

“可怜的孩子！”我战栗了一下。“也许，其中的许

多人已经死了……不！不要再灰心丧气了。该走了！他们在等我呢。”

我猛然把身上的连衣裙一掀，弄得接缝的地方嗤嗤地响了起来。我把凉鞋甩到墙角，套上了紧身的马裤，把穿丝袜子的双脚伸进了士兵的大靴子里。一开始我仿佛觉得，我穿着它挪不了地方。

我穿完以后，习惯地跑到镜子前面，又离开了。我面前站着的是一个战士，面容严肃、紧张。

披在脑后的头发妨碍戴船形帽。

“铰掉它，现在不是讲漂亮的时候。”我下了决心，从桌上抓起了大剪子。

“塔玛拉！”少先队辅导员喊我，“你马上就来？还是改变了主意？”

一个姑娘跑进室内，惊叫了一声：

“你怎么，把头发铰了？！都认不出你来了。我们快走！看，利沃夫发生了什么事：天一直是黑的！……”她指着窗外说，“孩子们最好在这里等着。”

我把士兵的宽皮带束紧一些，果断地说：

“我准备好了，走吧！”

乡间的土路折向树林里，树林深处十分凉爽，散发出树脂香气。

很快穿过了树林，扑面而来的又是六月的热风。道路两旁一闪而过的是长满鲜花的草地、茂密的灌木丛，带刺的树枝刮着驾驶室和车身。

迎面开始碰到一些身背冲锋枪的士兵，他们的面容严肃、紧张。

汽车拐到长满灌木丛的林中空地上，猛然刹住了车。

“到了。”司机说道。

我丈夫服役的团已经在树林中设防。

“瑟切娃，你向首长报告吧！”同志们委托我说。

团长和团政委站在刚挖好的掩体旁看一些文件。参谋长坐在不远的炮弹箱上，把图囊放到双膝上在写些什么。几位参谋在周围忙忙碌碌。其中许多人我都认识。

“只是现在不遇到丈夫才好！”我想道。果断地整理了一下船形帽，向首长们走过去。我问候了一下，并报告说，我们是在市少先队工作的十二名共青团员，决心自愿上前线。

“请接收我们到你们信任的部队中去服务。”

“好，”政委说道，“我们需要人民的支援，对自愿到部队所有的人都可以找到事情干。你看怎么样，中校同志？”他问团长。

“对，你们留下吧。不过不要胆怯！”

“我们年轻人都是坚定勇敢的。”站在我后面的仓库管理员保证说。

上校赞许地点了点头，走开了。这时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了一辆汽车，我丈夫从驾驶室跳了下来。他双眼瞪着我。我激动不安地向营教导员说：

“营教导员同志，我决定自愿上前线……可我丈夫要我后撤。请您支持我！”

热尔涅夫走过来，象平时一样衣着讲究、仪表堂堂。

“营教导员同志，请允许我和妻子讲话。”

“中尉同志，从今天起，您的妻子就是红军战士了。”教导员严厉地说道。

“允许我和红军战士讲话吗？”

“当着我面讲吧！”

丈夫当着教导员的面感到不自然，可是说得很尖锐，仍然坚持让我后撤。参谋长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感到一阵轻松。

“瑟切娃，”参谋长递给我一张纸，“和这个姑娘一起，”他用头向少先队辅导员那面一指说，“去找团卫生队长尼洛娃大尉，把这张条子给她。”

“我到那面去，可以把您送去，”站在不远处的团长副官上尉说道。

我丈夫明白，问题已经决定了，皱了皱眉头走开了。

在路上我和辅导员问副官：“怎么，你们的卫生队长是个女的吗？”

“是啊！”上尉回答说：“是一个坚定勇敢的姑娘，一个好同志，不久之前我们刚吸收她入了党……”他稍停了一下，又接着说：“她已经到过芬兰前线，还到过哈桑湖。她到我们这里来时就是卫生队长。她是个好样的姑娘，你们会从她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一开始大家象平常接待女指挥员一样，按旧眼光对待她，团长甚至对派来一个女卫生队长表示不满。可是很快大家就明白了，姑娘是很能干的。在她来到之前，严冬季节，我们的卫生队住在楼下的黑暗角落里。她不喜欢这一点，于是她占用了营教导员的房间。”上尉笑了一下，“而且从团长办公室里搬来了软沙发。她说，‘卫生队里的病人比团长更需要沙发，在团长那里下级大都是按口令立正站着的。’”

“好样的！”少先队辅导员惊叹道。

“战士们服她管吗？”我问道。

“噢，那还用说！不久之前她甚至让一个军官‘立正’，

并且下令让他‘向后转’，只是因为他当着她下属的面叫她萨申卡……影响了她在战士中的威信——这对一个女指挥员来说是重要的。尼洛娃建立的医院，我们的师都没有一个。她把所有有卫生知识的战士都搜罗到卫生队来了。”

我从内心里羡慕这位我还不认识的女指挥员。

我到前线有用处吗？这个问题使我十分激动不安。绕过老松树林的大块土地，我们来到了覆满灌木丛的林边。松树下面排列着用树枝伪装的大、小加农炮、高射炮和“马克辛”机关枪。战士们面容忧虑地在它们周围奔忙，一些人在擦炮，一些人从汽车上往下搬炮弹箱。

一些战士聚在野战伙房周围，把饭盒弄得叮当响。

“同志们！头一道是前线甜红菜汤！”一个戴白帽、穿白围裙的炊事员站在踏板上，挥舞着一把大长柄勺喊道。

上尉指给我们怎样到卫生队去以后，向左拐了。

“大概，这里就是。”我们走过了防水壕，看到隐藏在树丛中的救护车，我的同行人的小声道。

灌木丛下放着一副担架，一个身穿油污的军便服的战士用船形帽盖着脸，睡在一副担架上。就在离汽车不远的地方，两名卫生员蹲着一边小声说什么，一边往一个大绿箱子里装绷带和药包。就在他们一旁的灌木丛下有一个身穿军便服的姑娘。她的领章闪耀着卫生大尉军衔。她正往卫生包里装一些小包、小盒。

“一定是她！”

“不可能，太年轻了……”

这时坐在箱子上的一个卫生员向姑娘说：

“首长同志，一切都收拾好了。能叫醒叶夫多基莫夫装车吗？”